

建構中的國家安全——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淺析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副教授 葉定國博士

提 要

- 一、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在80年代中後期興起，90年代初開始成型並受到學界重視，至90年代中後期成為強勁的理論學派。
- 二、建構主義認為安全關係本質上是一種理念的構成，具有歷史根源，同時也是一種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了解。
- 三、建構主義認為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物質的(material)環境，而是文化的(cultural)和制度的(institutional)環境。
- 四、如何面對認同與文化因素對於國家安全的衝擊而採行有效的措施，將是未來國家或是國際安全體系所必須深思熟慮的問題。

關鍵字：國家安全、建構主義、文化、認同

壹、前 言

冷戰結束後，全球局勢產生了劇烈的變化，國際權力結構重新調整，但國際紛爭與區域衝突並未因時局轉變而有減弱的趨勢。諸如愛滋病、跨國犯罪與毒品走私、國際恐怖主義、核生化武器擴散、生態環境保護、資訊科技、傳播媒體、文化和種族的衝突等新的安全議題不斷出現，都對國家安全構成新的威脅。「安全」概念的內涵與外沿正不斷擴大，不再侷限於軍事領域，而是逐步延伸到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環境領域，其速度更勝於以往。而在國際社

會中，雖然國家安全依舊是安全研究的主要核心，但影響安全的因素已更為多元廣泛，舉凡社會、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心理等相關因素都有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影響。就理論層次而言，諸如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等國際關係理論已不能滿足當前安全研究的需求，除了傳統研究中的國家、無政府狀態、互利與自利行為、國際體制及集體安全等核心概念的意義必須重新加以釐清之外，而在後現代國際關係理論氛圍中所產生的不同研究途徑，諸如女性主義、建構主義等，也逐漸展現出豐富的研究潛力和解釋能力。隨著安全議題的擴

大，安全研究的方向必須重新深入和調整，以涵蓋更為廣泛安全研究的議題。

在眾多安全研究的討論中，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註一}是近年來一個重要的發展。建構主義理論在80年代中後期興起，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開始成型並受到學術界重視，而在90年代中後期成為強勁的理論學派。建構主義學者Wendt將建構主義定義如后：

它是國際體系的一種結構理論，其核心主張如下：一、國家是國際政治理論的主要分析單位；二、國家體系的關鍵結構是相互主體性的，而不僅僅是物質性的；三、國家相互的認同和利益是由這些社會結構所形塑，而不僅僅是外在特定因素對於國家影響所形成。^{註二}

根據其理論的基本論述，建構主義認為在國際間，安全關係本質上是一種理念的構成，具有歷史根源，同時也是一種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了解。因此，經由共有知識的分享和觀念的改變，各國的安全關係可以得到改善。建構主義試圖有系統的探討以下問題：如國家間的「大文化環境」如何影響各國對於生存和安全問題的看法？或

是這種環境如何改變國際體系內國家互動模式？領導人和民眾觀念的變化如何反向影響環境中的不同要素(如體制、制度安排以及文化)？^{註三}建構主義特別強調國際關係「文化」(或稱為共有知識、共有期望、共有觀念)的重要性，並認為唯有經過能動者(agent)(主要是國家)的共有觀念才能產生影響外顯行為的力量，也才能使國家的行為具有實質性的內容。因此，不論是國家安全、戰略文化、認同關係等概念，建構主義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對於安全議題的詮釋有著顯著的不同。本文期望經由檢視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理論假設及分析架構，進一步了解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安全研究領域中所產生的影響。

貳、建構主義出現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意義

一、方法論上的批判

從社會科學成為一門獨立科學開始，其亦是否具特有的研究方法，抑或必須和自然科學使用同樣的研究方法，產生同樣具有「科學」特質的知識，一直是社會科學學者探討的重要課題。

當前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如新現

註一 1996年，著名的安全研究學者Katzenstein 將90年代以來建構主義學者諸如Went,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omas U. Bager, Dana P. Eyre等人的作品集結成冊，編訂成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一書，本書匯集了建構主義有關國家安全議題的相關討論，可謂近年來建構主義學派在安全研究上的集大成作品。

註二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2 (1994), p.385. 摘引自莫大華，「千禧年後的臺海安全——批判性安全觀的看法」，遠景季刊(臺北)，第2卷第1期，民國90年1月，頁40。

註三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3-75.

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等)，其基本的方法論假設都是基植於科學精神及理性主義，亦即期望透過科學方法的運用和論證，建立「科學的」國際關係理論。因此，在上述的理論中，諸如國家的角色（如經濟學理性人的假設），國際體系的結構特性（以經濟學市場機制來觀察國家之間的互動），國際體系的基本特質——無政府狀態(anarchy)(如經濟學中，個人的自利可以為團體謀取最大的福利)等基本概念，皆是具有理性主義的精神，強調國家可以如同理性人一般，做出最有利的選擇。因此建構主義學者Wendt便認為新自由和新現實主義兩派理論，由於語言的趨同、同樣研究方法假設，使得二者的研究重心逐步整合。而共同的理性主義基礎，科學主義的研究原則，及無政府的邏輯假定、合作進化、制度產生的作用等，使得二者產生了所謂的新——新合作(neo-neo synthesis)的關係，進而成為可以通約的理論，這使得國際關係發展的動力受到了阻礙。^{註四}在這樣的氛圍中，建構主義對於主流國際關係的理論假設提出挑戰，建構主義期望透過對於國際關係方法論假設的批判重建，突破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缺乏創新動力的困境，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尋找新的思維。

在這樣的基礎上，建構主義不同於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強調的科學精神，建

構主義呈現了明顯的社會學特徵，強調整體對於個體的影響，亦即強調國際社會對於國家的作用。建構主義特別強調國際關係文化（或稱為共有知識、共有期望、共有觀念）對於國家的意義。同時建構主義也否定澈底的物質主義，提倡重視文化、觀念等理念因素的重要性。並且認為唯有經過行為體的共有觀念才能產生影響行為的力量，才能具有實質性的內容。^{註五}

二、建構主義的知識論假設

(一)建立具有「科學實在論」(scientific realism)基礎的國際關係理論

不同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科學主義精神，建構主義科學觀主要是基植於「科學實在論」的觀點，在這個觀點上，建構主義也強調建立國際關係科學知識的重要性。^{註六}雖然建構主義強調理念的重要性，但也並未放棄建立科學理論的努力。

所謂的「科學實在論」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意義是指國際體系雖然是無法直接觀察的結構，但它的運作確是實際存在的。而任何體系，不論是生物體系或是團體體系，如果是一個可以導致有意圖行動結構，而且可以觀察到行為的規律，便是有意圖的能動者互動之下的產物。而基植於這個基本的特性，國際體系具備了可以透過科學驗證的程序和方法加以分析的可能，因此，國際關

註四 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5-17。

註五 同註四，頁21。

註六 John Gerard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1998), p.886.

係理論也具備科學主義的特徵。^{註七} 建構主義學者Wendt便指出，雖然建構主義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研究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分野是很難清晰界定，但建構主義認為諸如國家和國際體系此類社會結構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一種集合性社會現象，對於個人而言，是獨立存在的事實，不能化約為主觀理念的思維產物。因此，建構主義認為人類可以取得對於社會現象的客觀知識，但必須通過嚴格的科學研究議程。如果否認社會類別不具有客觀，便等於否認了可以使用科學方法來觀察及研究社會問題。

而且雖然在社會科學研究之中，研究主體和客觀之間的關係不是如此的清楚，但是依然是可以加以區分。一如國際體系對於國際關係的研究學者而言，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其存在並不會因為研究而轉移。^{註八} 因此，建構主義並沒有完全採取詮釋性方法，而是強調建立嚴格的科學研究議程，也期望可以建立在其不同於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方法論假設下的「科學的」國際關係理論。

(二)強調理念因素的重要性

再就人類意識運作的特性而言，國際關係學者Ruggie便認為建構主義的部分觀點其實是基植於韋伯(Marx Weber)及涂爾幹(Durkheim)的社會學理論之中。就涂爾幹的觀點而言，人是受到社會結構的制約，並認為理念具有其

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不能因為其它因素而降低了它的重要性。理念在個人的表現上是個人對於社會秩序本質的了解。建構主義學者依循涂爾幹有關於社會事實的觀點，而集中討論概念(idea)和理念(belief)等因素對於國際關係的影響。

韋伯則是基於社會行動者對於社會行動意義的詮釋和社會意義的分享，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應該有不同的方法論假設。他認為當一個社會學學者嘗試的對於社會現象賦予定義的時候，也必須了解除了機械化理性推論的結果之外，同時也存在社會群眾對於集體所擁有規範的自我認知和理解。^{註九} 韋伯的論述說明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

在這樣的基礎上，建構主義企圖透過對於國家主權存在的宣示，建構了一個國家之間可以互動的社會場域，那就是國家互動所形成的國際社會(新現實主義稱之為國際體系)，而國家便以能動者(agent)的身分，在國際社會之中活動，同時評估損益，建構彼此的關係。換言之，建構主義將原本屬於社會學領域的社會互動觀點運用於國際關係領域的討論。因此，建構主義不僅關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承認，同時更主張國家主權是一種社會建構，應考量國家與主權之間的相互建構關係，以及在互

註七 對於科學實在論的探討，請參閱黃旻華，國際關係批判理論的重建與評論：科學實在論的觀點，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8年)。

註八 同註五。

註九 同註六。

為主體而相互認同的社群內，在互動磋商的基础上，透過實際上的建構、重新產生、重新建構及解構過程中，國家與主權所產生的各種不同方式及組合。^{註十}也因為國際關係是在國家為能動者身分的互動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所以國際關係研究不可能排除國家之間的社會性實踐，因此，稱之為社會建構主義。

參、建構主義的研究途徑

就上文所述建構主義知識體系的特徵而言，建構主義理論包含了兩個主要的原則，一是反對絕對的理性主義，因為國際政治社會性結構不僅僅影響行為體的本身，同時也建構行為體的身分和利益，也就是行為體的利益並不是根源於個別行為體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產生於行為體的互動之中，這是建構主義和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上最大的不同的之處；二是反物質主義，即國際政治並不僅是純粹物質性的結構，而更是社會性的建構，亦即反對素樸的物質主義觀點。^{註十一}在這兩個基本前提之下，建構主義轉而重視心理、文化背景和價值觀等「主觀」問題的研究；並對國際政治中的各種「規範」(norms)、「文化」(cultures)和「認同」(identities)等概念進行分析，並將其導入做為研究國際安全環境和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礎。換言之，在國際關係安全研究的領域中，建構主義認為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在很大

程度上不是物質的(material)環境，而是文化的(cultural)和制度的(institutional)環境；而且文化環境所左右影響的，不只是國家的不同行為動機，而且更是國家的基本特性——即所謂「認同」(identity)。^{註十二}

一、建構主義關於安全議題的基本觀點

建構主義者則認為國際間的安全關係本質上是一種理念的構成，具有歷史根源，同時也是一種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了解，並且由於國際社會所具有的社會性，使得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成為決定國際社會行為體存在和角色的重要因素。如果經由互動而進行觀念的改變和調整，各國的安全關係可以藉此得到改善。在這樣的基礎上，建構主義對安全議題有以下三點主張：

一是國際系統的結構不僅是物質的，而且也具有文化的特徵，包含了知識和觀念的分享。一個互為主觀機制的建立，才是國際安全的核心關鍵。建構主義認為，國際安全環境是社會化和物質取向的，同時這樣的環境可以提供各國對於各自利益的界定。國際社會層次的互動會改變國家的利益和身分，而國家間的集體認同也會出現在國際社會之中。許多國家的安全利益都是來自於特定的自我認同建構，而此一身分建構又和國家與國家的相互認知有關，因此，如果基本的認同關係維持不變，便可形成安全政策的基本原則。而如果認同關

註十 同註二，頁40。

註十一 同註五。

註十二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p.32-37.

係一旦改變，對於國家的安全政策便會產生根本的改變。^{註五}

二是文化與價值分享不僅影響了行為的動機，同時也包含了關係和身分認同的建立，各種不同的身分和關係的認定會影響到國家的利益和政策。^{註六}國際環境具有「社會性」，一旦國家的身分和對外的認同關係有所改變，也同時會影響國家的內部的結構。在一個自利(self-help)的系統中，國家和國家的認同關係傾向負向，每個國家都恐懼對方，使得國際關係形成一種零和遊戲，在這種系統中，國家的重點在於持續發展自身的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加以運用，同時建立自我防衛的合作協定。如美、蘇冷戰便是最好的例子。

而在另外一種國家合作的安全系統中，國家和國家的關係並非是負向的，甚至可能是正向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各國認為對方並不會對彼此造成立即的威脅，用此對於安全的考量便比較有限及簡單；同時一定程度的合作關係也可以為彼此創造有利的環境，在這樣的前題之下，國際體制的合作關係便有可能建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便是其中一例。

而第三種安全關係是集體安全的形成，其形成主要是深植於文化制度中的國家利益和認同關係為基礎，此種方式較之於合作性的安全關係更能避免強權的彼此鬥爭。在這樣的國際社會中，由於文化和相互認同的基礎，使得其中的國家可以在相互認同的基礎下，凝聚成一安全社群，各國對於彼此的安全都有助益，各國也並不希望以武力的方式來解決彼此的問題。如「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便是最好的例子。

三是國家本身形塑了國際社會，但同時也被國際社會所制約，國際社會的結構本身是中介機制，同時也是演變的結果。唯有透過能力和知識分享的能動者(agent)才能改變此種情況。自主性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過程，而國家運作的現況實際是自主性——結構的最適解決方案。^{註七}如果要形成改變，必須由觀念和互動著手。無政府狀況並不是國際政治的核心，而是要看國家如何創造所謂的無政府狀態。依據這樣的邏輯，國際間並不如新現實主義主張，僅存在單一的無政府邏輯，而是根據國家互動的不同而形成不同邏輯的無政府狀態。^{註八}

二、建構主義安全研究的分析途徑

^{註五}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p.6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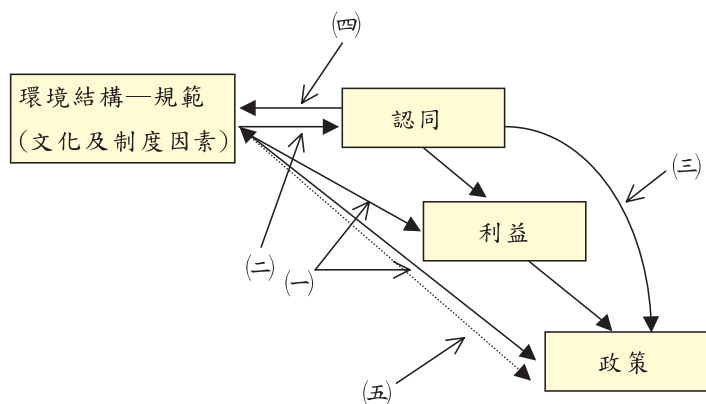
^{註六} Nikolas Busse, "Constructivism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Pacific Review, Vol. 12, Issue 1(1999), pp.39-61.; Edward Newman,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2, Issue 3(2001), pp.239-252.;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Issue 1(1999) pp.171-201.

^{註七} 有關於結構與能動者相互建構的過程及論辯，請參考 Ole Jacob. Sending, "Constitution, Choice and Change: Problems with 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and its Use in Constructivist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08, Issue 4(2002), pp.443-471.

^{註八} 同註四，頁328-387。

依據建構主義的理論及Wendt和Katzenstein等學者的觀點，建構主義關於安全議題的研究可以發展出五條分析途徑：(如圖)^{註七}

建構主義安全研究的分析途徑圖



資料來源：摘錄自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3.

(一)規範的影響 I：國家環境的文化及制度因素(或稱為規範)——形塑國家的安全利益和政策

所謂的規範(norms)，指的是各行為體基於集體認同所產生對於彼此合適行為的共同期望；有時規範會以規則(rules)運作的方式定義特定認同關係所應具有的合理行為。或者規範也可能是

定義行為體在某些特定環境之中的互動過程。^{註八}在這些情況之下，規範本身是一種相互建構的產物，因為任何行為體的“合理”行為，皆是源自於其它行為體

的認知，如果缺乏相互認知，便無法建構所有行為體所共同接受的規範。而這種建構規範的行為和動機是受到行為體內部及外部條件的影響，而在特殊的歷史和文化及制度因素下形成。規範的產生並不是行為體任何行為或是行動的必然保證，但它會提供行為體進行新行動的背景及思考動力。如Berger便認為由於受到了反戰思維的影響，使得日本和德國政府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無

法採行更為積極的國家安全政策。^{註九}而Price及Tannenwald則認為若干具有所謂“負責任”或是“較為文明”特質的國家，其內部自然會產生若干反對運用現代科技來大量屠殺人類的約制力量。

^{註十}

(二)規範的影響 II：國家所面臨的全球結構或是國內環境的文化和制度因素

^{註七} 有關此五項研究途徑的討論請參閱Ronald L Jepperson, Went, Alexander,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p.52-65.

^{註八}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 Gregory A. Raymond, "Problems and Prospect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Norm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1(1997), pp.205-246.

^{註九} Thomas U. Berger, "Norms, Ident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op. cit., pp.317-345.

^{註十} Richard Price and Nina Tannenwald, "Norms and Deterrence: The Nuclear and Chemical Weapons Taboo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op. cit., pp.114-143.

——形塑國家的認同

文化和制度的因素會建構或是形塑國家的基本認同，而認同(identity)的觀念會在國家的內外環境及利益的關聯上產生重要的影響。^{註二}認同此一概念，主要是源自於社會心理學，它主要的意涵是團體中的行為者在互動過程中彼此所形成及表現出來的特殊印象，因此認同關係是由行為者在彼此互動之中建構出來的，認同關係也因此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中。^{註三}而在國際社會中，認同概念被認為是國家（或民族）建構過程的一個標誌，在這樣的觀點之下，認同具有兩種意義，第一、認同是一個國家(或民族)集體特徵和意圖所具有的多樣意識形態；第二、認同是在國家主權的觀念下，國民全體在國內和國外的所展現的特殊性和多樣性。^{註四}Berger便認為全球化的結果，對於日本和德國的國家認同形成影響；同時長期以來軍國主義的文化和制度對於德國內政也產生深遠的影響。^{註五}

(三)認同的影響 I：國家認同的差異或是變化——影響國家的利益和安全政策

認同也形塑國家的安全利益，若干的安全需求（諸如生存或是物質條件）是源自於特殊的社會身分，但大多數的安全需求都是在與其它行為者（國家）相互認同彼此關係的基礎上形成的，這種過程是一種特殊的建構過程。^{註六}必要時，國家可以發展或是建構特殊的認同關係，以符合國家本身的利益。潛在而持續的認同關係發展可以解釋一個國家安全利益和政策的延續性和規律性。一方面國家認同關係的改變會對於國家安全利益和政策產生本質上的變化；另一方面，國家安全利益和政策的改變也標示著認同關係的變化。如Johnston便認為透過劃分朋友和敵人的認同關係，使得毛澤東的支持者認為和西方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是一種零和(zero-sum)遊戲；他也認為根源於中國傳統戰略思想及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戰略文化深刻的影響了「中國」的政治本質。^{註六}

(四)認同的影響 II：國家認同的樣態影響國家間互動的基本結構——如體制(regime)或是安全社群(security communities)

認同關係也可以解釋國家在國際

^{註二} Peter J. Katzenstein, (ed) op. cit., p.5, and pp.22-24.

^{註三}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Rejecting, Reconstructing, or Reread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Issue 1(2002), pp.73-98.

^{註四} Jeffrey T. Checkel,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Issue 4(1999), pp.545-561.

^{註五} Thomas U. Berger, op. cit. pp.317-345.

^{註六} Jef Huysmans, "Defining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 Security Studies: The Normative Dilemma of Writing Security,"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27 Issue 1(2002), pp.41-63.

^{註六}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op. cit. pp.216-256.

互動結構中——如體制或是安全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集體認同所形成的不具暴力性質的國際秩序，在國際危機出現時往往可以產生穩定國際局勢的作用。Janice便以此觀點論證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時，英美之間如何運用政治言語表達（而非軍事力量）來強化團結，避免二者的在嚴重意見分歧之下可能產生的分裂結果。^{註五}Risse-Kappen在研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時，便認為由於NATO會員國對於彼此身分的認同和面對共同的敵人，使得他們可以形成共同的行為規範，進而產生集體安全共識，進而建立安全社群^{註六}。

(五)回饋：國家政策對於文化及制度結構的重新建構或是再生。

伴隨著歷史的演進，文化和制度的結構都是在不斷建構和再建構的過程中。國家受到文化和制度因素影響之後所產生的安全利益和政策輸出，同時也會回饋並形成影響國家利益和安全政策的新因素。^{註六}如此循環，國家的利益和安全政策便不斷進行建構和重製。

綜而言之，建構主義者所探討的核心議題是有關人類意識及其對於國際關係所造成的影響。建構主義期望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展現一個更廣泛而具有研究潛力的國家行動邏輯，而這個行動邏輯便是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實踐中，同

時也在創造新的國際社會結構。由建構主義基本假設所導引出來的五條國家安全研究路線，雖然各自具有不同的研究重點，但仍不離文化及制度因素對於國家安全利益及政策影響的分析與評估。在國家安全的層次上，強調國家內部與國際結構的文化與制度特性將會影響到國家對外的認同關係，而這樣的認同關係將會影響到國家外顯的安全利益和政策；在國際安全的層次上，國家間彼此認同關係的建立將會影響國際間安全關係的互動和相關體制及規範的建立，進而影響國際安全。

肆、當前建構主義的研究現況

建構主義雖在90年代成為國際研究的重要學派，對安全研究提出不同於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的分析觀點，並對以往若干具有爭議的國際安全議題，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解釋。近來建構主義在安全議題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是針對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無法有效解決的議題提出解決方法。其成果主要集中於下列幾點：

一、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顯示出國家對於敵對國家力量會進行評估，並進而做出因應的對策。但卻缺乏國家對於其它國家為何產生敵意或善意的討論。而建構主義對透過對於規範和認同

註五 Janice Bially Mattern, "The Power Politics of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Issue 3(2001), pp.349-398.

註六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op. cit., pp.62-63.

註六 袁易，「對於Alexander Wendt有關國家身分和利益分析之批判：以國際防擴散建制為例」，美歐季刊，第15卷第2期，民國89年夏季號，頁265-291。

因素的檢視，提供了對此問題的部分解釋。^{註二}

二、對於「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的情況提出解釋；所謂的「民主和平」是指如果一個與國際社會密切結合，同時擁有市場導向自由經濟機制的民主國家，那它與其它具有相同條件國家發生戰爭的機會便會變小。建構主義關於這個議題的研究顯示民主國家對於合作規範的承諾，間接的避免了衝突逐步升高的可能。因為自由民主國家之間彼此認知到如果發生戰爭，對於共有價值和利益將會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傾向以合作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因此，自由民主觀念的推展，可以視為是安全範疇的擴大。^{註三}

三、是有關全球軍事化的討論，現實主義者認為全世界國家都是在相類似的思考上整建國家的軍事力量（意即尋找想像中的敵人，並為防止這樣的敵人

整建軍事力量），認為受到威脅的國家總是會竭盡所能的發展軍事力量。^{註三}建構主義的研究顯示出若干國家軍事力量發展的模式並不是源自於戰場上勝利，反而是一種熟悉度的選擇。“軍事力量現代化”的觀念使得一些國家極力的企圖“現代化”本身的軍事力量，即便會面臨基本科技條件或是經濟上的重大壓力。但卻缺乏對於所現代化軍事力量究竟為何的討論。^{註三}

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科學典範(scientific paradigm)的轉移必須出現強而有力的反例，同時這些反例所導引出的研究結果足以撼動科學知識的核心假設，並成為新理論出現的機會。建構主義這些研究成果是否已經形成了撼動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反例」，亦或只是對相同的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在學者間形成了激烈的討論。但就建構主義的基礎假設而言，建構主義在方法論上

^{註二} 可參閱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pp.186-187. Hopf cites 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For constructivist accounts of alliance dynamics, see Thomas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and Michael N. Barnett, "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Katzenstein, ed., op. cit., pp.400-450;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8, No. 213(1998/99), pp.198-234.

^{註三} 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t,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3 (1993), p.624; William J. Dixon, "Democracy an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No.1 (1994), pp. 14-32;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0, No.4 (1986), pp.1152-1169。

^{註三}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127.

^{註三} Alexander Wendt and Michael Barnett, "Dependent State Formation and Third World Militarization," Revi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9, No.4 (1993), pp. 321-348; Keith Krause, "Insecurit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Global Military Order: The Middle East Cas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 No.3 (1996), pp.319-354.

依舊面臨一個重大的困難，那就是如何顯示出規範在國家行為輸出上所產生的影響；社會事實的存在是可以被觀察的，但是如何才能了解這些共同分享的規範是如何存在的，雖然學者對於這個議題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法，^{註四}但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這個問題尚未得到妥適的解答。由於建構主義的相關研究被認為具有解釋能力，但卻缺乏預測能力，因此有學者認為建構主義的研究成果——「是一種聲音，但不是一種具體可見的標誌」。^{註五}就整體的研究成果而言，90年代之後建構主義的相關研究方興未艾，仍有相當發展的空間，但許多基本的問題仍待學者進一步釐清。

伍、結 語

安全議題討論隨著全球安全問題的日益嚴峻而受到廣泛的重視，國際關係安全研究的議題及理論也日益複雜，不同途徑的研究嘗試皆是希望可以對於層出不窮的安全議題提出更有解釋力及包容力的理論架構。但整體而言，由於動態演進的特性，使得「安全」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仍屬於低度發展的概念，其內容、議題、範疇仍有待進一步釐清。

一如學者Raimo Vayrynen所言，當前國際間的衝突是存在於各國的文化、政治、經濟條件之中，強權國家的政經和軍事力量或許可以產生影響，但並不能造成全面的改變。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大國的行動自由也有可能受到文化和認同因素的限制，而這可能是弱小國家爭取國家安全自主權利的機會。^{註六}或許當前對於文化和認同因素的討論仍有許多爭辯，但不可否認，文化和認同對於安全議題的影響正日益擴展，建構主義有關於安全議題的研究正是反映了這樣的一個趨勢，而911事件的出現，更是突顯了這些問題亟待探究的迫切性。如何面對認同與文化等社會因素對於國家安全的衝擊而採行有效的措施，將是未來國家或是國際安全體系所必須深思熟慮的問題。

收件：93年12月01日

修正：94年01月03日

接受：94年02月24日

作者簡介

葉定國博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國立政治大學三研所碩士、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現任職於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副教授兼任圖書館館長。

^{註四} 請參閱Anf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 "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 No.1 (2000), pp.70-72；而Legro，則是建議採行程序追蹤(process-tracing)的方法，意即了解長時間過程中規範演變的情況，同時加以分析並尋找解釋。這可運用於了解規範在特殊事件中所造成的影響。M. Legro,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6.

^{註五} David M. Jones and Mike L. Smith, "Noise but No Signal: Strategy, Culture and the Poverty of Constructiv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24 (2001), pp.485-495.

^{註六} Raimo Vayrynen著，「不連續世界中的集體暴力：區域性現實與全球性錯覺」，國際社會科學雜誌，第4卷第4期，民國88年，頁30。